

# 关于中国近代建筑发展动力机制的再思考

Rethinking on the Driving Force Mechanism of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ese Architecture

徐苏斌 | XU Subin

**摘要:** 20世纪50年代中国近代史主要以帝国主义和阶级斗争为主线索, 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了现代化的主线索。但是大量的研究致力于城市和建筑发展的客观事实梳理而疏于对于中国近代建筑发展动力的梳理。与其他殖民地国家和地区不同, 中国具有“半殖民、半封建”的特点。本论文集中于中国近代建筑发展动力的探讨, 认为中国的“半”的特征应该表现为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合作”的作用。

**关键词:** 中国、近代、建筑、民族主义、殖民主义

**Abstract:** In the 1950s, imperialism and class struggle were the main clue of 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and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main clue of modernization appeared. But a great deal of research has been devoted to the objective fac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cities and buildings, and neglected to the motive force of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ese architecture. Different from other colonial countries and regions, China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emi-colonial and semi-feudal”.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discussion of the motive force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odern architecture, and holds that the “half” feature of China should be shown as the “cooperation” of nationalism and colonialism.

**Keywords:** China, Modern times, Architecture, Nationalism, Colonialism

## 一、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三维框架的思考

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的背景和近代史研究十分接近。中国近代史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主要是以“帝国主义”和“阶级斗争”为线索考察近代史。1948年胡绳撰成并出版《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此书从帝国主义与中国的畸形政治关系中总结的经验教训，和稍早出版的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1947年）一起，对新中国的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53年初，胡绳撰写《中国近代史提纲》初稿，用于给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的学员讲中国近代史，此时他已经形成了阶级斗争为主要线索的史观。这些看法在《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sup>[1]</sup>一文中进一步明晰。体现胡绳理论独创性的是“三次革命高潮”这一广为流传的概念，从帝国主义到阶级斗

争史观的微妙转换也反映了中国于1949年以后历史线索从外而内的变化<sup>[2]</sup>。1950年代初期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郭沫若为首，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开始编辑《中国史稿》，1962年第四册近代史部分出版。1978年又根据该稿出版了《中国近代史稿》。这本书是“帝国主义”论的经典，同时也是贯穿半封建半殖民地史观的近代史。同时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帝国主义史观被用作内部阶级斗争的有力武器。1970年代末起，由于国家确立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现代化事业成为国家和人民共同关注和进行的主要事业，1990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为纪念建所40周年，举办了以“近代中国与世界”为题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以现代化为基本线索研究中国近代史，引起了广泛的关注<sup>[3]</sup>。

### 作者:

徐苏斌,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国际研究中心副主任。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51878438);  
天津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8JCYBJC22400);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项目 (12&ZD230)。

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1959年建筑工程部建筑科学研究院“中国近代建筑史编纂委员会”编纂了《中国近代建筑史》，虽然没有出版但是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1962年出版了上下两册《中国建筑简史》，第二册就是《中国近代建筑简史》。当时的史观是和中国近代史研究类似的，1949年以后对于近代建筑史在帝国主义、阶级斗争的史观支配下有很多负面的评价，因此影响了研究的推进。真正开始中国近代建筑的研究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了新的近代建筑史研究，清华大学和东京大学开始合作研究<sup>[4]</sup>。2016年出版了《中国近代建筑史》<sup>[5]</sup>。回顾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需要批判地考察帝国主义、阶级斗争的史观，深入地思考现代化的史观。笔者试图将近代建筑史纳入一个多维框架，并且更为积极地评价建筑近代化的进程。

笔者2017年在《建筑师》发表过《X+Y+Z——关于中国近代建筑史框架的思考并纪念〈中国近代建筑史〉出版》<sup>[6]</sup>说明了三维框架的思考。这个框架受日本学者沟口雄三（1932—2010）的影响。二战后日本的中国研究被边缘化，日本的中国研究代表沟口雄三在《作为方法的中国》<sup>[7]</sup>中批评了二战前和二战后日本的中国学研究倾向，提出在亚洲研究的视野下研究日本，把逐渐远离亚洲的日本研究再次和亚洲建立联系。在这本著作中提出了中国近代史的十字框架，即横向为外来影响，纵向为中国历史的延长。这个研究并没有引起广泛重视，但是笔者认为这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隐藏的框架，代表亚洲国家近代化的共性。笔者思考的近代建筑史研究的框架：

X轴是表现了受到外来影响以及对于海外影响的问题。笔者认为外来影响因时期不同，性质不同，强度也不同。在中国近代外来影响是多元的，但是1840年以后到1949年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笔者认为“半”是近代中国的典型特点，殖民主义这个“他者”刺激了民族主义的产

生，因此“半”也可以理解为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共同存在。两者有着十分复杂的关系，因为有殖民主义存在，刺激了民族主义的形成，也因为民族主义的高扬，推翻了殖民主义。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两者针锋相对，又在一定时期都对推进城市建设发挥一定的作用。本文重点讨论两者的关系。

Y轴表现传统的近代化问题。对于“传统”霍布斯鲍姆等著《传统的发明》<sup>[8]</sup>论及了传统是在不断变化中，新的传统不断被“发明”出来的过程。本文所使用的“传统”一词也是动态的，用Y轴表示。这个轴是动态的，既是传统被不断发明的过程，也是传统被不断更新的过程，捕捉传统的新陈代谢的过程正是近代建筑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和X轴比较，Y轴更侧重近代化的内面。

Z轴反映了近代学科之间的相互影响。从古代中国的学科体系转向近代学科体系过程中发生了重新编组和细分化，中国的城市和建筑在这个过程中和很多新型学科发生关系，研究相互影响和关系十分重要。近代是学科再编、分裂、组合的时代，传统的学科逐渐和新的学科融合、演变，西方的学科对中国产生影响，学科和学科之间存在着很多联系，因此在研究城市建筑时需要考虑和其他学科的相关性。

这个三维结构反映笔者目前对于中国近代建筑史的整体思考，目的是反思近代建筑史观，将中国近代建筑研究纳入多维视角，抱着更为积极主动的态度重新叙述

中国近代建筑史。笔者认为今后也有必要将这个框架放在其他被侵略国家进行探讨。

在这个框架下有很多值得讨论的问题，最核心的问题是如何看待中国近代建筑发展的政治动力。本文将就此问题进行讨论。

## 二、“主动受容”和“被动受容”的概念

中国近代较之古代受到更多外国的影响。接受这些影响可以分为“主动受容”和“被动受容”，结合图1说明。

“主动受容”主要是在民族主义动力下的受容，“被动受容”主要来自殖民主义背景下西方对于中国的各种渗透。

“主动受容”是中国近代的开始的标志之一，这里涉及国民国家这种想象的共同体的诞生。在清末民族主义形成之前更多地和“忠君”“爱国”等动力相联系。包括了“洋务运动”时期的造船、兵器、纺织等，“戊戌变法”时期引进维新思想，也包括新政时期引进学制，新的法律、雇佣外国技师建设铁路、留学生派遣等。在国民国家形成之后有明确的民族主义意识。民国时期聘请外国建筑师进行城市规划，留学生引进国外的市政建设理念、建筑设计理念等。科大卫的研究让我们意识到在中国国民国家和宗族这两种不同的共同体之间的衔接关系和古代、近代的分界问题<sup>[9]</sup>。当然古代的共同体不止宗族



图1：中国近代建筑动力机制示意图

的，还有宗教的、经济的，罗威廉的研究也是力图寻找国民国家诞生的前奏<sup>[10]</sup>，其中混杂了血缘、地域、经济共同体的要素。但是不论如何，在中国，宗族是个很根本的共同体。根据科大卫的研究，原本宗族的祠堂是同一姓氏的空间，但是清代已经是一个经济共同体，没有血缘关系者也可以购买放置牌位的地方，因此可以看到宗族和经济的关系<sup>[11]</sup>。另一种公共空间会馆则有较弱化的血缘关联，更重要的是经济关联。而近代公共空间如天津河北新区劝业会场（现在中山公园）则是由地方乡绅提议建设的空间，这里不仅是个经济共同体聚集的地方，也是民族主义萌芽的地方，这是近代国民国家形成的表现<sup>[12]</sup>。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伴随着出版发行对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为民族主义的扩散奠定了基础。如果从中国的主动受容来看近代建筑的开始，笔者的《中国近代建筑学的诞生》<sup>[13]</sup>以及王凯的《现代中国建筑话语的发生》<sup>[14]</sup>都是寻找主观意识的尝试。

在民族主义动力下存在“受容”和“反受容”两个方面的力。吉泽诚一郎在《爱国主义的创成》中研究了清末的问题，他使用了“爱国主义”一词<sup>[15]</sup>。中国近代“受容”和“反受容”多呈现交替的现象，例如19世纪70年代派幼童赴美学习，之后又出现反美倾向，20世纪初代之以学习日本，五四运动以后抵抗日货，逐渐出现抗日高潮，又因为庚款而留学美国，以后又学习苏联。在“帝国主义”史观的前提下多数研究探讨的是“反受容”，如义和团运动、抗日战争等被用作典型实例表现中国人民抗击外来侵略的经典。又如为了夺回铁路路权中国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这些都是论证“帝国主义”史观的最好素材，因此在1949年以后的近代史研究中得到较充分的挖掘。与之相反，近代城市和建筑高度体现“主动受容”的领域内容，从洋务派如何建设工厂到中国近代建筑学、土木学的引进，再到回国建筑师的的活动，这些是近代中国建筑史的核心内容，不承认“主动受容”的存在就不能解释上述一系列现象，因此应该既强调民族主义动力下“反受容”，更应该承认民族主义动力下大量“主动受容”的存在。

民族主义是政治动力之一。民族主义的产生是因为有“他者”的存在。因此我们不能单独讨论民族主义的动力问题，这里涉及殖民主义动力

的问题。

关于殖民主义的研究有很多<sup>[16]</sup>。在世界范围殖民主义的表现是多种多样的，在中国也是这样，并且因为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造成了更为多样的表现形式，有东北日本的侵占地，在天津有九国租界，在上海有公共租界，在中国香港还有港岛、九龙、新界三种不同的侵占形式，这些都是属于在殖民主义背景下的“被动受容”。

在中国，笔者认为由殖民主义引起的“被动受容”具有两面性。马克思曾经总结以殖民主义为背景的殖民过程：“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sup>[17]</sup> 德鲁兹（Gilles Deleuze）用“去疆界化”（Deterritorialization）“再疆界化”（Reterritorialization）的话语概括了类似的殖民步骤，这两个过程随时都在发生，而且不仅限于地理、城市等物质意义上内容，也包括了制度、概念等多种非物质意义上的内容。德鲁兹认为欧美帝国在与其他帝国之间的竞争会导致世界范围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是“资本主义机器”特有的病症，“资本主义机器”在新的接触地带反复进行着“去疆界化”，为了从物质流动中榨取剩余价值而对之进行解码并且使之成为公理，资本主义的辅助设施，如政府机构和法律与秩序的力量，就越是要尽其所能疆界化<sup>[18]</sup>。而何伟亚（James L. Hevia）认为英国对于中国的“规训”就是从“去疆界化”到“再疆界化”的过程。“去疆界化”的过程有柔和的和暴力的两个方面，通过贸易和宗教是个柔和的过程，而通过军事行为则是暴力的过程。欧洲早期在美洲的殖民是通过暴力实现的，后期英国逐渐采用外交的手段实现殖民，这种怀柔的殖民方式从印度就开始了，鸦片贸易就是一个打破原来区域封闭贸易的“去疆界化”过程，将中国拉进世界贸易市场，如果外交无效才动用武力。鸦片战争、中法战争、镇压义和团都是去疆界化过程。占领紫禁城是摧毁中国自尊的深层去疆界化过程。英国在日本采用了更为柔和的办法，甚至英国驻日本全权公使阿礼国（Rutherford Alcock, 1807—1897）<sup>[19]</sup>1863年因为擅自向日本鹿儿岛炮击而被英国外交部撤掉公使之职，这反映了英国的殖民政策的转变。因此，“去疆界化”是为“再疆界化”做准备。

在天津，八国联军攻破天津老城，拆毁四

周城墙，这就是“去疆界化”过程。而八国联军在占领天津之后组建了都统衙门，建立了一系列管理和建设城市的制度，包括警察制度，都是“再疆界化”的过程，最终目的是建立一个以帝国为核心新体系。“被动受容”的话语主体是被殖民者，“去疆界化”以及“再疆界化”的话语主体是殖民者。

“被动受容”如果可以作为近代开始的指标之一，那么有必要探讨“被动受容”的起始。传教是值得关注的问题。西方向中国传教的历史一般从景教开始，但是这里只论及殖民时代的传教问题，基督教在中国传教虽然给中国传播了西方科学技术，在中国建立教堂、学校、医院，这些实质上是规训的工具或者手段，传播宗教是最重要的目的。传教过程也有大量的经济活动，这为“帝国主义”开拓殖民地铺垫了道路。周锡瑞 (Joseph W. Esherick) 论证了葡萄牙航海家亨利王子 (Prince Henry the Navigator, 1394—1460) 不仅是为了寻找黄金和香料，还是作为基督教大主教去传播福音的。他认为“贸易和基督教从一开始就成为西方建立帝国的不可或缺的原动力。”<sup>[20]</sup> 何伟亚在《英国的课业》余论中的精彩评述：“毫无疑问，按照理解 19 世纪殖民主义的一般标准，中国并不是欧洲的殖民地。但我认为，这些主要涉及政治控制程度的标准，未能全面反映 19 世纪欧美帝国构建过程的多方面表现。如果用更宽泛的文化标准理解殖民主义，或者把殖民主义理解为一系列建立霸权的工程，那么，欧美的外交官、商人、传教士和士兵们在中国的作用，就与他们在非洲和亚洲其他地区的作用极其相似。”<sup>[21]</sup> 余凯思 (Klaus Mühlhahn) 认为：“传教不仅是殖民主义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在殖民主义当中还能够发挥着整合作用。”<sup>[22]</sup> 另外周锡瑞认为传教士支持鸦片战争，支持武力<sup>[23]</sup>。这种受容也还值得探讨，传教早于殖民活动，也许有的是反对殖民活动的，还有一些西方研究者的活动也有相同的问题。因此本文讨论的“被动受容”更主要指殖民主义背景下的受容，

这个部分至少笔者认为传教也属于“被动受容”。

比较少的案例是传教士受雇于中国皇帝从事建设活动。例如圆明园始建于 1709 年 (康熙四十八年)，是康熙赐给尚未即位的雍正的园林。西洋楼景区于 1747 年 (乾隆十二年) 开始筹划，至 1759 年 (乾隆二十四年) 基本建成。整个占地面积不超过圆明三园总占地面积的 2%，只是一个很小的局部而已。但它却是成片仿建欧式园林的一次成功尝试。由西方传教士郎世宁、蒋友仁、王致诚等设计指导，中国匠师建造。笔者认为圆明园的西式建筑是朝贡体系的延长线上的副产品。清帝国的对外关系来自朝贡体系，费正清用很多精力研究了朝贡体制，他成功地说明了朝贡体制目的是为了建立帝国的威信，巩固自己的统治。圆明园的建设反映了当时清朝对外关系的自信。在那之后，外交的平衡逐渐发生变化，何伟亚在《怀柔远人》中以马嘎尔尼使团的例子建立了另一种言说，即两个帝国的较量<sup>[24]</sup>。这样的较量开始英国的“教程”，也让中国从朝贡体系的主动式外交关系转换为以殖民主义为背景的“被动受容”的外交关系。这个转折点也让我们思考在建筑方面的古代和近代的结合点问题，如果以“被动受容”作为近代中外关系的开端，那么这个案例应该属于近代以前的对外关系体系。可以理解圆明园和殖民主义开始的近代意义不同，这也是可以划分近代的分水岭。笔者认为近代的划分可以有多种多样，取决于论述的角度。如果从“主动受容”的角度考察可能就不能以 1840 年为界限划分近代，新政改革是一个很清楚的“主动受容”分水岭。此外各个学科的近代化进程是不同的，医学、考古、建筑、人类学的近代其实划分界限都应该不一样，应该深入进行各个领域的近代化进程研究，从而形成总体认识。

在建筑方面随着海外资料逐渐被发现，在宗教和租界方面的研究有了重要的进步。关于贸易口岸的研究，海外建筑师的研究，租界的研究都有长足的进步<sup>[25]</sup>，

这些研究都反映了对“被动受容”研究的推进。

### 三、关于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动力机制的讨论

#### 1. “+”和“-”的作用力

我们可以看到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动力都带来“+” (建设) 和“-” (破坏) 两个方面的结果，殖民主义可以理解为“去疆界化”和“再疆界化”两个过程，前者往往和“-”面作用联系在一起，“再疆界化”往往和“+”面作用有关。值得注意的是“再疆界化”产生的“+”面作用和“主动受容”产生的“+”面作用都可能达成推进近代化的结果，它可以解释推进近代化的细节原因，但是性质完全不同。

我们研究的近代城市和建筑发展多属于“+”的过程，这是近代城市史和建筑史研究的特点。这个特点是在“帝国主义”史观有意逃避的话题，需要以新的框架补充。外国列强在上海、天津等沿海城市建立了表现西方文明的租界区，或者像日本在大连、长春等建设了近代化的城市，这些城市的规划甚至比日本本国还要先进，日本在华北使用了当时最先进的城市规划理念进行规划，成为天津经济开发区新港的基础，但是这是“再疆界化”的成果。《英国的课业》告诉我们“再疆界化”就是殖民主义者建立的一个新的编码。面对“他者”在中国进行“去疆界化”以及“再疆界化”的活动，中国人反映出来的“反受容”就是拒绝殖民主义者在中国“再疆界化”的过程，防卫和强化自己已有的疆界。

#### 2. 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相互作用

同时期，在朝鲜、中国台湾日占时期总督府完全受到日本的控制，民族主义被压抑到不能和殖民主义势均力敌的状态。而在清末民初仅仅在沿海和中国台湾、东北的局部地区受到殖民主义控制，中国依然始终有自己的政治控制力，机器局的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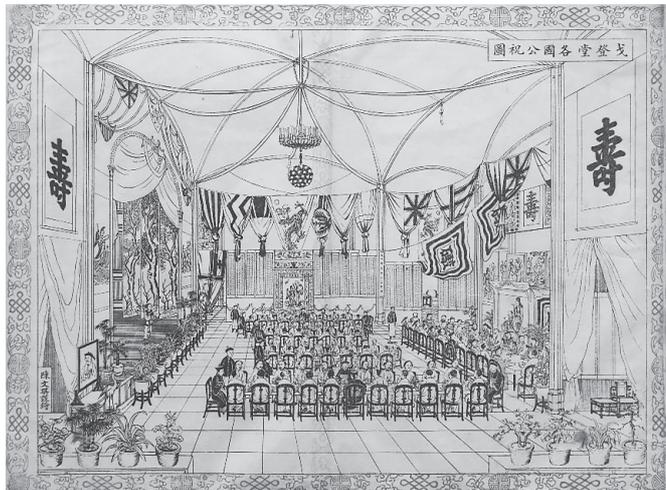


图2：李鸿章七十大寿在天津英租界英国工部局戈登堂接受各国公祝(1893年)



图3：周学熙和日本顾问藤井恒久、北洋财政处顾问佃一豫、考工厂艺长盐田真合影(1906年于李鸿章祠堂)

筑也就应运而生了。我们看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被动受容”和“主动受容”之间的关系，李鸿章一面是制造军火的天津机器局的缔造者，另一面是又是英国工部局的座上客（图2）。袁世凯一面是义和团运动以后新政改革的实行者，另一面又和具有殖民地性质的租界关系密切，原大阪府商品陈列所所长藤井恒久<sup>[26]</sup>担任日租界管理机构租界局行政委员职务，同时也受到袁世凯重用，担任北洋工艺总局顾问和工艺学堂总教习。此外袁世凯还雇用了北洋财政处顾问佃一豫<sup>[27]</sup>、考工厂艺长盐田真<sup>[28]</sup>等众多日本顾问（图3）。中国的城市和建筑不断地学习“他者”的经验，在各地建设了“拟洋风”的建筑（例如北京大栅栏、陆军部等），而“他者”则模仿中国的建筑样式建设了学校、医院（例如协和医院、燕京大学等）。这样的矛盾反映了半殖民地中国的典型特色，即同时存在“主动受容”和“被动受容”。清末是中国民族主义形成的初期，在这个转折点笔者认为“洋务运动”时期天津机器局、大沽船坞还带有“忠君”“爱国”的色彩，然而殖民主义对中国的威胁促使清末中国民族主义迅速形成。

德国余凯思 (Klaus Mülhahn) 也在《在“模范殖民地”胶州湾的通知与抵抗——1897—1914年中国与德国的相互作用》中描述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再疆界化”过

程，并说明“对抗”和“相互作用”表明了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共同作用<sup>[29]</sup>。

### 3. 合作的四种模式

笔者归纳了X轴中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力的共同作用有如下四种可能模式（图4）：

第一，民族主义背景下的“+”作用和殖民主义背景下的“-”作用的叠加在客观上起到了推进近代发展的作用。例如清末铁路建设是中国政府和外国签订借款合同，在合同中多有对于国外技师雇佣的附属条件，这些合同的签订和技师的雇佣是在整个殖民主义背景下发生的，其目的是获得中国的路权。但是另外一个方面中国也看到铁路的重要性，在19世纪80年代以后从唐山胥各庄开始自主创建铁路，在当时的条件之下不得不借用国外的资金

和技术，其作用是建设了中国自己的早期的铁路<sup>[30]</sup>。

第二，民族主义背景下的“+”作用和殖民主义背景下的“-”作用叠加。天津机器局是在1860年英法联军从天津登陆进攻北京，掠夺和破坏圆明园的活动刺激了中国民族主义，从而建设的北方军事工业基地，但是1900年被八国联军彻底破坏。“去疆界化”在此发生作用，殖民主义的破坏和民族主义的建设相抵触。

第三，民族主义背景下的“-”作用和殖民主义背景下的“+”作用叠加。1900年义和团对使馆区的围攻，义和团摧毁天津租界是中国人抵御“他者”的案例。

第四，民族主义背景下的“-”面作用和殖民主义背景下的“-”面作用叠加。这样的破坏多发生在战争期间。战争给中国带来灾难，也阻碍了近代发展。

以上四种情况划分了历史的不同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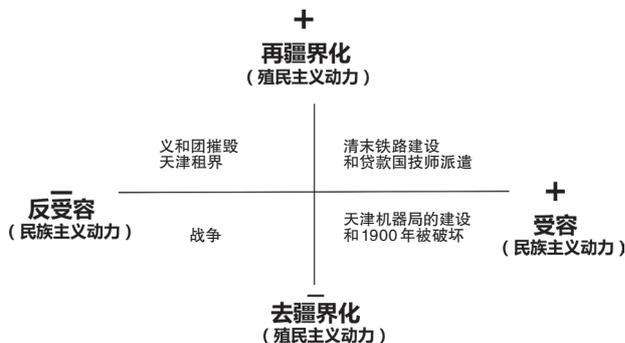


图4：在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动力的共同作用下的四种可能性

型，这只是一种表述，试图说明中国近代发展的复杂性。城市建设和建筑事业更多表现为第一种现象，在天津，租界的建设成为华界建设的“教程”，更重要的是成为刺激华界建设的作用力。除了中国留学生出国学习城市管理和建筑之外，租界成为最直接、最近距离的老师。

进一步讨论可以发现这四种模式可能在不同的地区反映出不同的程度与具体状况。随着殖民程度的不同有不同的表象，在殖民地城市民族主义权力受到强烈的压抑，因此不可能有很多主动性活动，多位学者都在强调不同地区的细化研究，我们可以尝试从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角度来比较和定位不同地域的近代化发展特征。中国的差异很大，例如在中国香港、大连、青岛等地主要的建设活动是殖民性质的活动。而在中国的内地则受到这种活动影响较少，因此更多地呈现出“主动受容”的表象，在山西等内地则表现出更多的中国自己的近代化尝试，不能单线索地比较而认为内地落后。沿着这个思路可以深化不同地区的近代城市和建筑研究。当然不一定就限制在中国内，以日本为例，日本几乎没有受到中国这样的割地赔款就进入“主动受容”阶段，背后的原因有很多，这正给比较研究提供了可能性。

近代化取向是改革开放后研究近代史的主流，那么近代化研究什么？可能最关心的是近代性问题。在19世纪很大成分是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较量，两者是共存的，而且广泛传播，谈到近代性问题首先就要细化这两个问题，思考动力机制问题。

#### 四、小结

近代中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因此在城市建设上也反映了“半”的特征，即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共同作用。这样的特征不同于完全被殖民的国家。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两者的合力就是近代中国城市建筑近代化的政治动力。

笔者认为两者之间充满矛盾，是对立的关系，也是“共谋”的关系。有破坏和建设两个方面的内容。在近代政治史研究上比较强调对立的一面，但在论及城市和建筑的历史的时候，应该考察其推进近代化的一面，否则无法解释并全面、客观地评价近代城市和建筑的近代化进程。

笔者认为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两者动机完全

不同，这决定了他们的冲突，但是在城市建设方面殖民者尝试最先进的手段推进殖民地或者租界的建设时又让民族主义者暂时“忘记”了动机问题，选择了“合作”。或许这种“合作”正是马克思所指出的历史发展的“合力”？然而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合作并非一种安定的“合作”，他们从根本上是对立的，民族主义可以说是为了反对殖民主义而诞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为这种“合作”画上了句号。

#### 注释

- [1] 胡绳. 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 《历史研究》创刊号, 1954年.
- [2] 三次革命高潮为太平天国、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辛亥革命.
- [3] 龚云. 20世纪80-90年代中国近代史研究“现代化视角”的兴起. 武陵学刊, Vol.35, No.2, 2010.3; 罗志田. 近三十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变与不变——几点不系统的反思[J]. 社会科学研究, 2008, (6); 也概括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中国近代史研究.
- [4] 张复合. 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十八年. 亚洲近代建筑网络(mAAN)第四次国际会议, 上海, 2004; 村松伸. 空间文化资源的评价及其继承——写在近代建筑史研究国际合作20年之际. 张复合 主编, 中国近代建筑研究与保护, No.5,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8; 张复合. 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二十年(1986-2006), 张复合 主编, 中国近代建筑研究与保护, No.5,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8; 李蔚楠. 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评述(1986-2010). 建筑学报, 2012, 10.
- [5] 赖德霖, 伍江, 徐苏斌主编. 中国近代建筑史[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6.
- [6] 徐苏斌. X+Y+Z——关于中国近代建筑史框架的思考并纪念《中国近代建筑史》出版[J]. 建筑师, Vol.189, 2017.10
- [7] 沟口雄三著, 李甦平等译. 日本视野中的中国学.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6.
- [8] (英) 霍布斯鲍姆(Hobsbawm, E.) 兰格(Ranger, T.) 编, 顾杭、庞冠群译. 传统的发明.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4
- [9] 中国(香港) 科大卫. 皇帝和祖宗: 华南的国家和宗族. 南京: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2009.
- [10] (美) 罗威廉, 江溶等译. 汉口: 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 [11] 中国(香港) 科大卫. 皇帝和祖宗: 华南的国家和宗族. 南京: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2009.
- [12] 徐苏斌, 青木信夫. 清末における勸業博覧会の受容と都市空間の再編過程 - 直隸工芸総局の成立事情と日本 - 稲賀繁美編. 伝統工芸再考 京のうちそと 過去発掘 現状分析 将来展望. 思文閣、京都、2007年7月、410-445頁.
- [13] 徐苏斌. 中国近代建筑学的诞生. 天津: 天津大学出版社, 2010
- [14] 王凯. 现代中国建筑话语的发生.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5
- [15] 吉澤誠一郎. 愛國主義の創成. 岩波書店, 2003
- [16] Frederick Cooper, *Colonialism in Question: Theory, Knowledge, Histo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Ann Laura Stoler. *Along the archival grain: epistemic anxieties and colonial common sens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Jane Burbank and Frederick Cooper, *Empires in World History: Power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刘亦师的《殖民主义与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的新范式》(《建筑学报》2013年第9期)讨论了中国近代建筑史中的殖民主义问题。

[17] 马克思. 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 第10版.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70-75.

[18] Gilles Deleuze and Felix Guattari 1983. *Anti-Oedip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by 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Robert Hurley, Mark Seem, and Helen R. Lane; preface by Michel Foucault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c1983, 34-35. 转引何伟亚《英国的课业》P24

[19] 阿礼国(Rutherford Alcock, 1807—1897) 英国外交官。鸦片战争后1844年35岁时被任命福州领事, 1846年任上海领事, 1855年广东领事。1859年阿礼国被任命为驻日全权总领事。1865~1869年任英国驻中国特命全权公使。

[20] (美) 周锡瑞著, 张俊义, 王栋译. 义和团运动的起源.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5, 2005年重印 Joseph W. Esherick. *Origins of the Boxer Uprising*,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80.

[21] (美) 何伟亚著, 刘天路译. 英国的课业: 十九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pp378-379

[22] (德) 余凯思著, 孙立新译, 刘新利校. 在“模范殖民地”胶州湾的通知与抵抗——1897-1914年中国与德国的相互作用.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5, 336页. Klaus Mühlhahn. *Herrschaft und Widerstand in der 'Musterkolonie' Kiautschou. Interaktionen zwischen China und Deutschland, 1897-1914*. R.Odenbourg Verlag. München. 2000.

[23] (美) 周锡瑞, 张俊义, 王栋译《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5年, p82

[24] (美) 何伟亚著, 邓常春译. 怀柔远人: 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25] 赖德霖、伍江、徐苏斌主编. 中国近代建筑史[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6, 各卷内容。

[26] 藤井恒久出身于日本石川县, 1883年5月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应用化学科, 工学士。

[27] 佃一豫(1864—1925) 是明治大正时代的官僚银行家, 东京大学政治学科毕业后进入内务省, 后来任大藏省参事官, 松方正义首相的秘书官, 大阪神户的海关长。到天津后除了担任租界局行政委员会会议员外, 被袁世凯雇佣为财政顾问。

[28] 盐田真(1837—1917) 是明治工业界的先驱, 东京士族出身, 1875年到1876年任东京国立博物馆工业科长。曾经向海外介绍日本的陶器, 任朝鲜政府美术顾问, 作为博览会事务官被派往美国和法国。1897年执教于东京美术学校图案科。此外还历任商务省技师。

[29] (德) 余凯思著, 孙立新译, 刘新利校. 在“模范殖民地”胶州湾的通知与抵抗——1897—1914年中国与德国的相互作用.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5. Klaus Mühlhahn. *Herrschaft und Widerstand in der 'Musterkolonie' Kiautschou. Interaktionen zwischen China und Deutschland, 1897-1914*. R.Odenbourg Verlag. München. 2000.

[30] 徐苏斌. 中国的都市·建筑与日本——「主体的受容」の近代史. 東京: 東京大学出版会, 2009, 第二章。

#### 参考文献

[1] 胡绳. 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J]. 历史研究, 创刊号, 1954

[2] 龚云. 20世纪80—90年代中国近代史研究“现代化视角”的兴起[J]. 武陵学刊, Vol.35, No.2, 2010.3;

[3] 罗志田. 近三十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变与不变——几点不系统的反思[J]. 社会科学研究, 2008, 06.

[4] 张复合. 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十八年. 亚洲近代建筑网络(mAAN)第四次国际会议, 上海, 2004; 村松伸. 空间文化资源的评价及其继承——写在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国际合作20年之际[C]. 张复合 主编, 中国近代建筑研究与保护.No.5,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8; 张复合. 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二十年(1986—2006)[C]. 张复合 主编, 中国近代建筑研究与保护, No.5,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8; 李蔚楠. 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评述(1986—2010)[J]. 建筑学报, 2012, 10.

[5] 徐苏斌. X+Y+Z——关于中国近代建筑史框架的思考并纪念《中国近代建筑史》出版[J]. 建筑师, Vol.189, 2017.10.

[6] 沟口雄三著, 李甦平等译. 日本视野中的中国学[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6.

[7] (英) 霍布斯鲍姆(Hobsbawm, E.) 兰格(Ranger, T.) 编, 顾杭. 传统的发明[M]. 庞冠群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4.

[8] (香港) 科大卫. 皇帝和祖宗: 华南的国家和宗族[M]. 南京: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2009.

[9] (美) 罗威廉. 汉口: 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M]. 江溶等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10] 徐苏斌, 青木信夫. 清末における勸業博覧会の受容と都市空間の再編過程-直隸工芸総局の成立事情と日本-[M]// 稲賀繁美編. 『伝統工藝再考 京のうちそと過去発掘-現状分析-将来展望』思文閣、京都, 2007.

[11] 徐苏斌. 中国近代建筑学的诞生[M]. 天津: 天津大学出版社, 2010.

[12] 王凯. 现代中国建筑话语的发生[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5.

[13] 吉澤誠一郎. 愛国主義の創成. 岩波書店, 2003.

[14] Frederick Cooper, *Colonialism in Question: Theory, Knowledge, Histo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Ann Laura Stoler. *Along the archival grain: epistemic anxieties and colonial common sens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Jane Burbank and Frederick Cooper, *Empires in World History: Power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15] (德) 马克思. 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 [M]//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版)[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70-75.

[16] Gilles Deleuze and Felix Guattari 1983. *Anti-Oedip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by 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Robert Hurley, Mark Seem, and Helen R. Lane; preface by Michel Foucault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c1983, 34-35. 转引何伟亚《英国的课业》P24.

[17] (美) 何伟亚著. 英国的课业: 十九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M]. 刘天路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24.

[18] (美) 周锡瑞著, 张俊义, 王栋译. 义和团运动的起源[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5, 2005年重印, p80. Joseph W. Esherick. *Origins of the Boxer Uprising*,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19] (德) 余凯思著, 刘新利校. 在“模范殖民地”胶州湾的通知与抵抗——1897-1914年中国与德国的相互作用[M]. 孙立新译.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5. Klaus Mühlhahn. *Herrschaft und Widerstand in der 'Musterkolonie' Kiautschou. Interaktionen zwischen China und Deutschland, 1897-1914*. R.Odenbourg Verlag. München. 2000.

[20] (美) 何伟亚著. 怀柔远人: 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M]. 邓常春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21] 徐苏斌. 中国的都市·建筑与日本——「主体的受容」の近代史[M]. 東京: 東京大学出版会, 2009.

图片来源:

图1、图4: 作者自绘;

图2: 陈文琪绘, 罗丰禄等辑. 合肥相国七十赐寿图[M]. 海军石印书局照相石印, 1892.

图3: 天津博物馆藏。